



历史的见证

(1929—1969年)

〔美〕查尔斯·波伦著





历史的见证

(1929—1969年)

〔美〕查尔斯·波伦著

刘裘金胡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Charles E.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3

内部发行

历史的见证

(1929—1969年)

[美] 查尔斯·波伦著

刘 裘 金 胡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21¹/₂印张 441千字

1975年12月初版 197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80 定价：1.65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1904年—)的回忆录。波伦自1929年进入美国外交界起,就以致力研究苏联问题和处理美苏关系为专业。他先后任美国驻外使馆的多种职务及美国驻苏联、菲律宾和法国大使,并充当了几任国务卿的苏联事务特别助理和负责政治事务的代理副国务卿。在1969年腊斯克辞职和罗杰斯接任的空挡中,波伦还当了两天代理国务卿。不久,他就挂冠离职。

② 这本回忆录于1973年在纽约出版,全书是围绕美苏关系问题展开的。波伦据其亲身经历概述了1934—1969年整整三十五年来美苏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史料比较丰富。作者由于自己的职业地位,有较多机会跟随美国政府首脑出席各种重要国际会议,甚至参与了某些重大的决策,如: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同斯大林和丘吉尔举行会谈时,波伦是罗斯福的顾问和翻译;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是杜鲁门的翻译;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波伦当过他的顾问和翻译;在约翰逊掌权期间,波伦经常向他献计呈策。无论战时或战后,凡属美苏关系问题,他总是备受咨询或主动献策,这就使这本回忆录或多或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决策人物和机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想法和企图。同时,作者在叙述中也就苏联方面对一

系列重大事件的动机和意图作了自己的探索和分析。书的最后部分对美苏关系的前景提供了某些展望。这对于我们了解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了解苏美关系及其发展,了解苏美政府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和手段,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波伦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豢养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谋臣策士,他的立场和观点是十分反动的,从而,他对许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也是错误的。他除了竭力维护美帝的扩张政策和霸权主义外,还处处表示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仇视,如:胡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符合俄国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多次攻击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其政策,个别涉及我国的地方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和诬蔑,等等。请读者注意分析和批判。

本书内部发行,仅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1975年4月

目 录

原编者附言	1
前言	2

第一部分 见习时期

第一章 马合烟的气味	6
第二章 幻想的破灭	20
第三章 枪决,枪决,枪决	49
第四章 挫折的一年	73
第五章 来自纳粹大使馆的情报	86
第六章 密切注视德苏合作	110
第七章 在东京的拘禁	132

第二部分 在总统手下工作

第八章 第一次莫斯科会议	148
第九章 德黑兰会议	165
第十章 进入白宫	192
第十一章 雅尔塔会议	215
第十二章 白宫的变化	251
第十三章 波茨坦会议	279

第三部分 在国务卿手下工作

第十四章	贝尔纳斯，被人低估了的国务卿·····	300
第十五章	马歇尔，一位杰出的国务卿·····	320
第十六章	坚持留在柏林·····	341
第十七章	朝鲜事件回忆·····	359

第四部分 出任大使

第十八章	约瑟夫·麦卡锡的失败·····	384
第十九章	克里姆林宫换岗·····	420
第二十章	集体独裁·····	441
第二十一章	东西方共处·····	465
第二十二章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490
第二十三章	匈牙利革命·····	505
第二十四章	苏伊士运河危机·····	530
第二十五章	流放马尼拉·····	550

第五部分 最后的年代

第二十六章	U-2飞机事件和最高级会议的流产·····	574
第二十七章	古巴导弹危机·····	591
第二十八章	伟大的夏尔·····	623
第二十九章	莫斯科的最后一瞥·····	652
结束语	·····	671

原编者附言

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与众不同。奇普·波伦不会打字，他在圣保罗中学和哈佛大学读书时练出来的一手书法很不容易辨认。因此他象有些作者那样，使用磁带录音机。他就其毕生事业紧紧按照年代顺序口授了大约六、七十万字。接着开始为期十一个月的整理工作：我提问题——查对、探索，以至追问，目的在于澄清思想，更正错误，补充材料。他的答复仍由磁带录音，然后誊写出来，插入原稿，经过重新编辑，压缩为四十万字左右。在随后一年半时间里，这样的过程又进行了两次，我提问，他对着录音机答复，我再删改稿子。最后的作品，即大约二十二万字的这本书，确实是奇普的；他作了研究，亲自撰写，并且核对了事实。我作为稿件的组织者和整理者，对于他对尖刻的盘问和大刀阔斧的剪裁所表现出来的毫不气馁的态度和高度耐心，只能表示非常钦佩。

罗伯特·H·费尔普斯

前 言

这本书是从事美国外交工作将近四十年的个人经验和观察的搜集，是一个非常幸运地目睹和参与 1929—1969 年美苏关系中每一重大事件的外交官的回忆录。

虽然这本书的每一节都和那些重要年代的大事密切相关，但它既不是、也无意于作为一本美苏关系史。命运倒曾赋予我以不寻常的观察者的地位，当一些伟大的领导人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时，我在他们的身旁，但任何见证都有局限性。不同的眼力所看见的景象不同，不同的听觉所听闻的音响不同，不同的思想所感受的情势也各异。因此，我自认此书的确不能看做是一部不偏不倚的历史。

这本书也不是对美国和苏联政策的功过的分析，尽管我在指出我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时从未有过犹豫。我的回忆录不是想要为美国政策辩护，或者对修改历史的历史学家进行攻击。我只是力图叙述、阐明和解释我经历过的事情。

我力求表述我曾为之效劳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其他高级官员在其任职期间给我的印象。在评价人物时，我总想尽量避免事后高明之嫌。所以，我对这个时期美国领导人的评价不应被理解为无可争辩的。它们只是一个有幸和他们亲密地共过事的人所表示的个人意见罢了。

因为必须处理的材料是这样浩瀚，挑选起来势必要下点

狠心。个人所经历的那些材料，只有和美苏关系的主题紧密相关的，才被采用。在菲律宾和法国大使任内的材料，虽从年份来说应该多写一些，但在本书中只给予较小篇幅。对于我的同事们也不可能一一提及。对于我在莫斯科、马尼拉和巴黎三地大使馆任大使时的全体外交、办事人员，以及我在国务院任职期间的助手们的美德和忠诚，我谨在此表示敬意。

我也要向阅读过初期手稿并给予许多有益的批评指导的三个人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乔治·F·凯南和已故的卢埃林·E·汤普森，他们两人都出任过驻苏大使，在外交界负有盛名。另一位是达特默思大学的历史学家拉里·史密斯，现任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托马斯·J·麦金太尔的行政助理。

我还要向W·W·诺顿公司副总经理埃文·托马斯致谢，是他鼓励我著作此书，并帮助我解决了写作中的许多困难。

最后，我感到难于用言辞表达对《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新闻编辑罗伯特·H·费尔普斯的深切谢忱，没有他的无比珍贵和一贯的协助，要完成这本著作是决不可能的。

查尔斯·E·波伦

第 一 部 分

见 习 时 期

第一章 马合烟的气味

茫茫暮色笼罩着俄罗斯平原。这时，从华沙开往莫斯科的列车驶进了苏联边境的涅戈列洛叶村，我们跳到站台上。这是我踏上苏联领土的第一步，标志着我在俄国经历的开始。这番经历时断时续，长达三十四年以上。谁都不可能预见未来，即使懂得西伯利亚魔术的黄教僧侣也无法未卜先知。在那晴朗的、白雪皑皑的1934年3月7日这一天，我由于到达苏联而内心过于激动，以致除了几天内即将在苏联创建的第一个美国大使馆外，我当时不可能预想得更多。然而，展现在前头的将是二十世纪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特写镜头：斯大林的大清洗；纳粹-苏联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最高级会议；马歇尔计划；冷战；封锁柏林；击落U-2间谍飞机；古巴导弹危机。苏联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主要因素。

我做过这样的计划：选择苏联作为我研究的专业；从1929年进入外交部门开始，用五年时间为从事处理美苏关系的前程作好准备。我只是在决定充当一名外交官以后才选择这个专业的，但已想不起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决心干这一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孤立主义在美国盛行，外交肯定不是一种讨人喜欢的职业。在那经济繁荣时期，我在哈佛大学（1927年我以文学士学位毕业于该校）的大多数朋友为发财致富的

欲望所驱使，都打算投身股票市场、银行业或法律界。这样的前途于我并无魅力，我对商业不感兴趣，也不喜欢上述任何一类职业。

无论如何，我和大多数同辈相比，多少得到较多的世界知识⁴ 4 识教养，可能是这个背景使我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外交界。1904年8月30日，我诞生于纽约州克莱顿——千岛^① 之一——我家的避暑别墅中，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我父亲查尔斯是继承了少量财产的有闲阶级，我母亲塞莱斯丁·尤斯蒂斯在新奥尔良出生以后就是亲法的。他们喜欢到欧洲旅行，而且经常携带我们兄妹三人同往。我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到欧洲旅行。1912—1913年的冬天，我们是在瑞士的韦维度过的。在那里，我们就学于罗贝先生，练习法语；乘雪橇在小雪山滑雪；还让瑞士的巧克力给喂胖了。

在以后几年，我到过西欧大部分国家。我母亲对于我的影响大大超过我父亲，每次旅行她总要把法国列入路程之内。她对法国的热爱渊源于她是法国人的后裔，以及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住过四年。她父亲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1893年由克利夫兰总统任命为第一任驻法大使。在此之前，我国所有外交代表的级别没有超过公使级的。在他大使任期内，我母亲充当了大使馆的女主人，因为我的外祖母已经去世了。正如我们这些孩子所熟知的，我母亲对于法国的迷恋几乎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二十年代初，有一次在从瑟堡开往巴黎的火车上，她指着牧场上一群乳牛令人生气地说，“你们必须承认，它们比美国的乳牛可爱。”

^① 圣劳伦斯河中一群小岛。——译者

这样，我在早年就有奔赴国外的意愿。但是，甚至在大学期间，这样的意愿还没有使我做出要当外交家的最后决定，在毕业的时候，我仍然对于应该选择哪项职业犹豫不决，因此，当偶然有机会到一艘将作六个月环球航行的不定期货轮上充当见习水手的工作时，我立刻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远航归来，我依然犹豫不决。在回国后的几个月里，我同亲属和朋友断断续续地研究了可能选择的各种职业。有人建议我进外交部门，并且提到我住在华盛顿的表姐威廉·C·尤斯蒂斯夫人同国务院的人相识。尤斯蒂斯夫人安排我去拜访负责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R·卡斯尔。正是1928年夏末的这次谈话，终于使我下定决心要当一名外交官。

5 风度潇洒和文质彬彬的卡斯尔先生直率而颇有见解地对我讲述有关外交部门的问题。他指出，由于1924年通过了关于外交职务的罗杰斯法案，国务院终于能够为对外交事务真正感到兴趣的年轻人提供体面的前途。我特别关心的是报酬。我错误地认为——甚至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没有薪俸以外的个人收入，谁也不可能在外交事业上获得成就。卡斯尔解释说，1924年法案规定的薪俸和津贴虽然不算太多，但足够维持象样的生活。他还说，有各种迹象表明，情况将不断地改善。他消除了我的顾虑，我决定争取到外交部门去。

同现在一样，当时必须通过一次包括笔试和口试的考试。考试前，我觉得最好是先到乔治城的一所私人学校去听课。这所学校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可尊敬的克劳福德先生举办的。这位先生爱好威士忌酒，拥护民主党。他颇为博学，在为期两

月的授课期间，他通常是坚决戒酒的。可是，在1928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在弗吉尼亚获胜，克劳福德在选举的第二天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教室，发表了一通关于“弗吉尼亚州的奇耻大辱”的情绪激昂的讲演，然后有一个星期不再露面。

由于克劳福德的指导帮助，我毫不费力地通过了笔试。那时候笔试比现在容易得多。我必须回答的试题只要求具有简单的事实知识，例如在列举的各个重要军事战役后面填上日期。此后不久，由普林斯顿大学约瑟夫·格林教授改革了这种考试方法，其目的不再是测验应考人是否记忆史实，而在于考查他的推理和写作能力，要求写出论文式的答案。

笔试几个星期后举行的口试也不困难。但在一个关于美国农业人口百分比的问题上，我却答错了。口试由国务院、文官委员会和商业部的代表组成的评议小组提问。对我来说，预料要身临这样的场面是令人神经紧张的。赴考前，我在自己的屋子里喝了从走私商那里买来的杜松子酒，借以壮胆。显然，评议小组有人闻到我回答问题时的酒味，因此在研究我的申请书时极力主张外交部门不应录用违反国家禁酒法令的人。⁶幸而卡斯尔是小组成员之一，他说服其他成员让我通过。

圆满完成考试以后，我于1929年3月26日为外交部门录用。我的初步训练是外交学院为期四个月的学习。象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一样，学院设在紧挨白宫的一座外貌异常难看而内部相当舒适的建筑物里。它现在通称为行政办公大楼，是白宫的附属建筑物。外交学院的教程主要是实用主义的，例如学习处理护照申请书、签证货单的手续等。关于一般外

交政策，很少加以讨论。我国当时盛行的孤立主义哲学反映在关于一个外交官应如何汇报外国政治事件的课堂教学中。他应当客观而简明地提出报告，决不偏袒任何一方。

外交学院的学习结束后，我实习期的第二步是要求掌握外交手腕的某些基本技能。国务院认为，在富有经验的官员监督下进行学习，是最好的方法。我被指派到欧洲事务司司长J·西奥多·马里纳手下工作几个月。顾长、谦恭和具有巨大耐心的马里纳教我答复美国公民来信的初步知识。他经常的训诫是使有争议的问题平息下去。当时顽固的新教徒纷纷来信，因为他们担心美国将会向罗马教皇派遣外交使团。在马里纳的指导下，我起草的回信都是不痛不痒的，向那些关于罗马教皇的事提出警告的人保证，说国务院将考虑他们的意见。

马里纳是充塞于国务院各个要害部分的保守派外交官的典型。他们专心致力于孤立主义，打算为自己的国家做点好事。(1937年，马里纳被一个要求护照签证未遂的人杀害于贝鲁特，当时他在那里任总领事。)但是，这些守旧的人认为美国并未肩负什么重大责任。他们认为天下太平，美国只要不管别国的闲事，就绝无受人攻击之虞。两个主要的世界强国——英国和法国——被认为是友好的，即使美国有反对殖民主义的传统。这是因为它们同样持有西方基督教对社会的基本民
7 主观点。其他的大国——德国、意大利、苏联、日本和中国——当时也没有表现明显的威胁姿态。美国无需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

结果，国务院任务轻松，需要为之操心的危急局面并不